

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危機之影響

吳 塏 義

(作者爲本校歷史系專任教授)

摘 要

經過戴高樂十年來的統治，法國已呈現一片偉大、繁榮的景象。然而，一九六八年五月危機，却猶如晴天霹靂，震撼了戴高樂政權，也幾乎導致其崩潰。

危機的發展分三階段：學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危機爲期達一個多月，參與者上千萬人，其規模之大和情況之嚴重，的確在法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造成很深遠的影響。

危機使戴高樂贏得新的國會選舉，使戴高樂積極實施「參與」的主張，導致法國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但也使法國經濟成長和財政金融穩定，遭受嚴重打擊。

自一九五八年五月復出後，戴高樂將軍在十年期間，使法國變成一個強大而繁榮的國家。但是，一九六八年五月由學生所引起的危機，持續一個多月，幾乎拖垮戴高樂政權。危機由學生啓其端，再由工人繼之。

學生發動暴亂之因有四：對整個社會的不滿；法國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合時宜；國際性之傳染；學生組織與政府的關係不和諧。工人罷工的動機則爲工資的提高，工時的減少和工作條件的改善。（註一）

危機的發展分爲三個階段：五月二日至十三日爲學生的危機；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爲社會的危機；二十七日起則開始政治的危機。戴高樂總統在五月三十日的廣播中，所表現的堅定立場，以及國會的解散和改選，使危機逐漸解除。

這次的危機，爲期達一月有餘，暴動的學生和被佔領的大學，遍及全國。罷工的人數近千萬，爲全法國勞工人數之半，被

佔領的工廠達百餘間，全國的運輸和經濟活動，近似癱瘓。如此大規模且情況嚴重的危機，其所帶來的影響，將是相當深遠。本文將試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等方面加以探討。

一、政治的影響

危機使戴高樂總統在五月三十日宣佈解散國會，（註二）危機也使戴高樂派在六月下旬的大選中，贏得輝煌的勝利，並導致左派的分裂。

國會議員選舉日期訂為六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註三）在一十三日的選舉，戴高樂派——「保衛共和聯盟」（Union pour la Défense de la République，簡稱U.D.R.），獲得百分之四十六以上的選票，比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的選舉增加百分之八左右。共產黨減少百分之二·五。在第一回合投票即告當選者，戴高樂派和其友黨在一百五十四席中佔一百四十四席，共產黨佔六席。（註四）

根據內政部公布的資料，戴高樂派在總數四百八十七個席次中，贏得三百五十一個席次，比前一年的選舉增加一百零八席；共產黨獲得三十四席，減少三十九席；社會黨獲得五十七席，減少六十一席。（註五）

戴高樂派的勝利，乃因大多數法國人對於危機的厭倦和恐懼，戴高樂派善於利用這種恐懼來打擊左派，以及危機令左派進退維谷。

經歷一個多月的危機，對於愈來愈多的法國人來說，返回正常情況的時刻，似乎也該來臨。出門或上班要步行，垃圾堆滿大街小巷，現鈔和某些食物的缺乏，甚至電視節目也被剝奪。這些日常生活的困擾，皆是危機所造成的。難怪巴黎人會抱怨：「我希望他們趕快結束他們的革命」。（註六）

大多數擔心社會動盪不安會繼續下去的中年人，認為往日時光較好的老婦人，還有那些富家子弟，將會投給戴高樂派。戴高樂的其他傳統支持者更會有同樣的想法。希望穩定的法國婦女，擁有資產的大企業家、地主和投資者，還有那些反對暴動和罷工的農民、小商人和職員，皆會支持戴高樂派候選人。最令人驚奇的是，許多在數星期前手舉紅旗，高喊「打倒戴高樂」（

A bas De Gaulle!) 的工人，竟然也投給戴高樂派。在贏得工資增加和其他的讓步之後，工人們認為戴高樂比毫無治國經驗的共產黨，較能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註七)

上述對於危機深懷恐懼的人們，構成所謂的「恐懼的一羣」(Party of fear)。為贏得他們的大力支持，戴高樂派採取一項簡單的戰略。他們邀請法國二千九百萬選民，在戴高樂所承諾的和平的社會和經濟改革，與共產黨的激進和革命性改革之間作一抉擇。此外，還將過去十年的和平與穩定，與革命份子十天的混亂作比較。一位政府官員說：「唯有戴高樂阻止每一個人，效法旅鼠(lemming)，跳下懸崖。」(註八)

戴高樂派的競選口號為：投給戴高樂派候選人，即是投給法律、秩序和穩定；投給反對黨，即是投給混亂和「共黨極權」的最大災難。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 1911—1974)總理秉承戴高樂總統的旨意，利用各種機會，把此一競選口號發揮得淋漓盡致。

他在一次電視上的競選演說，向全國選民提到在法國的五月革命(France's May revolution)中，假如左派勢力獲勝，所將可能產生的恐怖景象。毫無疑問地，共產黨將加入政府，且逐漸建立獨裁政權，就如同他們在其他各地所做的樣。取代戴高樂成為國家元首的反對黨領袖——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註九)在有抗拒共產黨奪權的任何表示時，可能立刻被推翻。龐畢度最後還強調：「今天，紅色旗幟可能將正式飄揚在法國的總統府和所有的市政廳。」(註一〇)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龐畢度在卡歐(Cahors)從事競選活動時，再度譴責「共產黨及其盟友」在五月暴亂期間，試圖以武力奪取政權。他說：三色旗(註一一)和紅旗之間的差別在於，一方面人們有自由和選舉權，另一方面則為一黨制、警察國家、強迫勞役和罷工的非法。一個人民之民主或許是某些其他國家的最好制度，但它絕對不適合法國。(註一一)

他在家鄉剛達爾(Cantal)從事競選活動時說：「親愛的朋友，選擇很簡單；它必須在極權共產主義與自由和民主之間去做。」同時，在整個法國，戴高樂派的助選員設法利用一卷在巴黎塞納河左岸暴動時所拍攝的三十分鐘影片，來重新點燃起一般法國人對五月暴動的厭惡。(註一二)

面對着戴高樂派猛烈的攻勢，法國共產黨似乎也盡其全力，去說服法國選民，相信其資產階級的性質。許多共產黨候選人

在散發的競選傳單上印着下列的標題：「反對無秩序和反對混亂——請投共產黨。」法共總書記羅榭（Waldeck Rochet）在從事競選活動時宣稱，其政黨為「法律和秩序的政黨」，一個曾在最近法國的暴動中表現一種「責任感」（Sense of responsibility）的政黨。（註一四）

在第一回選舉結果揭曉後，法共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é）承認，法共試圖以一個尊重法律和秩序的文靜、民主，且幾乎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之姿態出現，來解除游離投票者之恐懼感的做法，並未成功。（註一五）

巴黎「世界報」（Le Monde）表示，如果說左派的力量無法贏回「恐懼的一羣」，那很可能是因为反對黨無法讓人相信它為「希望的政黨」（Party of hope）。許多法國人包括大部份共產黨和社會黨往昔的支持者開始相信，左派的政治家稱得上是笨手笨腳者已算不錯，最糟的是犯有過度政治野心的嚴重罪惡。密特朗在危機的高峯時期，宣佈他正準備接掌政權。此一不智之舉，無疑地，嚇跑了許多原來應該屬於左派的選票。（註一六）

事實上，在危機末期大多數法國人已深信戴高樂總統必能領導他們渡過危機時期。在五月二十五日的社論，「泰晤士報」（The Times）提到，「無人懷疑，大多數的法國人將樂於見到秩序的恢復；或許大多數人也認為，將軍（指戴高樂）是唯一能够使之恢復的人。」（註一七）

在六月三日發表的一項由「法國民意機構」（The French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主持的民意測驗顯示，支持戴高樂總統繼續在位者達百分之五十七。（註一八）

危機給戴高樂派製造打擊左派的機會，危機也加深法國人民對戴高樂總統的支持，這些皆是贏得選戰的重要因素。此外，為防止極左派份子在選舉期間滋事，法國政府在六月十二日發佈命令，禁止在選舉期間進行公開示威，以及解散七個革命性的學生組織。（註一九）為贏得右派選民更多的支持，戴高樂赦免一些極右派的政治人物。

在大選前，戴高樂總統准許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末期，陰謀推翻戴高樂失敗後，流亡巴西和比利時達六年之久的前總理畢多（Georges Bidault）返回法國。他還赦免一九六一年在阿爾及利亞發動法國陸軍兵變流產而被判無期徒刑的沙朗將軍（Raoul Salan）及其同黨十餘人。（註一〇）

倫敦「星期電訊報」(The Sunday Telegraph)在社論中稱，戴高樂此舉爲刻意要贏得他們所代表的一百餘萬極右翼的選票。(註111)「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也表示，此舉顯然爲贏得右派和法國阿爾及利亞死硬派(French Algerian diehards)的支持。(註111)

六月下旬選舉的結果，各左派政黨皆喪失半數以上的席次。左派政黨領袖，除了法共頭子羅樹在第一回即告當選外，社會黨的密特朗和德輝爾(Gaston Defferre)須參加第二回選舉，曾任總理且爲法國左翼重要領袖的曼德斯·法蘭西(Pierre Mendès-France)則以些微票數敗北。(註111)談到此一選舉的結果，法國名政論家阿隆(Raymond Aron)說：「……就我個人來講，儘管我並非戴高樂派，我發現此一投票結果爲可預料的、不可避免的，且非不合理。他們還可能投給誰？」(註111)

在選舉期間，左派陣營已出現裂痕，選舉過後，裂痕更爲加深。在第一回的選舉，共產黨推出四百六十二位候選人，密特朗領導的左派聯盟(Federation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Left)推出四百位。另外，對革命性學生組織公開表示同情的「統一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Unifié)在曼德斯·法蘭西的領導下，推出三百一十七位極左翼的候選人。統一社會黨的作法，顯然地分散左翼的選票。(註115)

選舉後，左派陣營立即起內鬭，互相推諉失敗之責。共產黨譴責極左翼的積極份子嚇壞選民，使之投給戴高樂派。在左派聯盟內部，密特朗的追隨者，把該政黨的衰微，歸咎於聯盟內那些老社會黨員意識形態的僵化。聯盟的領導份子還責罵統一社會黨在競選活動期間公開攻擊共產黨和密特朗，嚴重損害左派的利益。綜觀整個情況，一位傑出的密特朗份子(Mitterrandist)宣稱：「法國左派的脊椎骨已經折斷。」(註11K)

十一、經濟的影響

一個多月的暴亂和罷工，以及政府爲解決罷工問題在工資方面的讓步，的確在法國甚至在歐洲的經濟方面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1. 危機期間造成的損失

危機期間，法國工業生產損失慘重，觀光事業收入大幅度降低，資金外流，財政收支出現赤字，法郎（franc）幣值大跌。在全國總罷工期間，法國工業生產每日的損失，據估計約有四億五千萬美元。（註二十七）六月三日，龐畢度總理警告罷工人要返回工作崗位，否則那一年的法國經濟成長將降低到零。他說，罷工已經耗去法國全國生產的百分之六，亦即大約六十億美元。（註二十八）企業利潤將減少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註二十九）

危機的嚴重性，造成交通的癱瘓和日常生活的不便，觀光事業因而受到打擊。觀光客在法國的花費，約等於法國出口總值的百分之十二。在一九六八年的前四個月，官方數字顯示，法國觀光事業比前一年成長百分之五，包括巴黎旅館業百分之七的成長。在暴亂之前，預計一九六八年整個觀光事業的收入為十一億美元，比一九六七年增加百分之三至四。（註三十）危機發生後，由美國發動的取消旅館和旅行團的浪潮，很快波及其他歐洲國家，預訂在七月和八月到法國的旅遊，被取消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而且數字有逐漸上升之勢。（註三十一）為挽回這些被嚇走的觀光客，以增加法國的外匯收入，法國政府派遣代表團到歐洲各國首都，向他們強調法國已經恢復常態。觀光客購物得享有八折優待，並且不必付汽油稅；旅館和餐廳的價格仍維持原狀。（註三十二）從法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我們可以瞭解，法國觀光事業受到危機的打擊，必定不小。

航空公司也是危機的直接犧牲者，例如，自法國開始罷工，倫敦和巴黎之間的空運停頓，英歐航空公司（British European Airways）和法國航空公司（Air France）的損失，總數超過七十萬英鎊。（註三十三）

五月危機導致資本大量外流，外國人持有的法郎趕緊脫手，同時法國資金也設法輸出。自五月起，外流的資金已超過十七億美元。五月二十九日，法國開始實施外匯管制，直到九月四日止。（註三十四）現鈔、支票或黃金，非得政府核准，不能離開法國。外國銀行不能買賣法郎。但是外匯管制的效果不佳，法國人把錢走私到瑞士，再以低於官價一成至兩成的價格出售。甚至有人擋出價值三萬美元的現款。（註三十五）

眼看著外匯管制還是無法阻止資金外流，法國開始動用其在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全部貸款，向「十國俱樂部」（

Club des Dix) 的會員國借貸二十億美元，並且犧牲自己三分之二以上的黃金和外幣的儲存，以穩定法郎的幣值和彌補財政的赤字。(註三六)

2. 提高工資之影響

罷工的結果，就是工資的提高。根據政府與勞資雙方代表於五月二十七日在勞工部達成的協議，保證最低工資提高百分之三十，達到一小時三法郎，工資增加百分之十，工作時間每星期減少一至二小時。(註三七)

依照新契約，一九六八年的勞工成本，很可能提高到百分之十五，而非早先所預測的百分之八或九。(註三八) 在七月初，麵包、牛奶和汽油的價格已經上漲。汽車售價上漲百分之三，而且還可能更高。(註三九) 一九六八年的物價可能上漲百分之五至七。(註四〇)

政府為抑制通貨膨脹，可能會採取較高稅率和較少貸款的措施，再加上勞工成本的提高，許多小的和邊緣企業就須關門大吉；企業有日漸集中化之趨勢，而失業工人的人數將隨之大增。

3. 對歐洲其他國家之影響

危機對於歐洲國家的影響有利，但也有弊。工資和社會福利的增加，導致法國難於避免的通貨膨脹，以及生產成本的提高，這些皆將有利於其鄰國對法國出口的成長。此外，法國政府仍然肯定要遵守歐洲共同市場 (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 的義務，在七月一日取消對其歐洲貿易伙伴的工業產品之關稅。這項行動將更刺激工業產品的輸入法國。戴高樂總統的顧問們告訴他說，進口的增加將消除一些工資提高後所帶來的通貨膨脹之影響。何況法國尚有足够的黃金和其他外幣的儲存，以應付一段相當期限的財政收支的不平衡。(註四一)

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的專家也認為，法國危機的長程影響，可能給予歐洲經濟適時的繁榮。(註四二)

有些人認為，英國企業家能够在第三世界的主要出口業務，取代法國廠商。但是，「英國工業聯盟」（The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却表示，離企業家「希望太多」（hope too much）為時尚太早。（註四三）

危機對於法國的鄰國也會帶來立卽的不良影響。英國汽車和威士忌酒堆積在英國的港口，無法橫越英倫海峽運到英國的第一大消費國。西德擔心其剛萌芽的經濟復甦，可能受到法國暴亂之危及。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及其他共同市場會員國，也感受到與法國貿易量的銳減。（註四四）

罷工波及到在法國的英國工廠之生產。在一九六五年年底，英國在法國的直接投資達到一億一千七百六十萬英鎊。到危機發生之時，其投資額或許已達一億一千五百萬英鎊。當然，這些英國人擁有的工廠，絕大多數受到危機的影響而中斷其生產。（註四五）

三、社會的影響

工人購買力的迅速增加為危機的主要經濟結果，但是隨之而來的却是工業成本的提高，以及無法避免的失業。（註四六）一九六七年法國失業人數已較前增加，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危機過後，情況會更趨嚴重。工資的大幅度提高，將迫使小規模、效率不佳的工廠關閉，將其所雇之工人拋到職業市場。工會官員表示，失業工人達五十萬，略低於全國勞力的百分之二。但某些經濟學家認為，失業數字不會那麼大，約有二十五萬人。（註四七）「新聞週刊」（Newsweek）則預測，失業人數到一九六九年將達到一百萬。（註四八）

法國政府計劃協助被迫須支付較高工資的中小型公司，但是它們之中有許多仍將宣告破產或者合併，其他則以引進新式機器設備，或以澈底的改組來減少勞工成本。一項最近的調查顯示：四分之一的老闆計劃裁減工人，百分之九十的老闆在最近的將來不再雇用新工人。另外，法國政府財政支出的削減，將延緩法國核子武力的發展。這也意味着較少的工作，較多的工人加入失業的行列。（註四九）

在社會方面，危機除帶來失業外，還再度加強戴高樂總統實施「參與」（Participation or association）的信念。自第一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戴高樂就開始提出「參與」這個觀念，然而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五月危機發生時，它還是未能認真地付諸實施。（註五〇）

一九六八年六月，他仍然以「參與」作為競選的口號。六月七日，藉着與記者杜亞（Michel Droit）在電視上的對話，戴高樂總統向法國人民解釋其「參與」的觀念。他表示「參與」是一種有關工人尊嚴和條件的深刻改變。（註五一）在他看來遇到社會變動時，「參與」是優於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的一種解決方式。「參與」改變現代文明中人的條件。此後，人們聚集在一起，為一項共同的經濟活動而奮鬥，譬如為推展一種工業付出必需的資本，或經營、管理和技術才能或勞力。它是所有的人組成一個公司，一個大家皆對其利潤和對其良好的運作表關心的公司。這意味着每一份子皆能分享其利潤，並得參與政策的決定。

（註五一）

戴高樂解釋，一個企業必須有一位董事長和一位總經理，但這並不與「參與」有任何矛盾之處。在一個實施員工參與的公司，每人皆對其運作表關心，每人皆願管理當局領導有方。討論為衆人之事，執行則為一人之事。在「參與」是如此，在其他各處亦是如此。（註五二）

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的記者會上，戴高樂說明在一個企業中，「參與」必須包括三種不同的形式。對公司所有員工，首先分享公司所得的直接物質利益；其次，告知衆人利益攸關的公司營業現況；最後，讓員工瞭解其建議案之可行性，並且盡量使之能實際採行。（註五四）

「參與」在法國人民心中引起三種反應：感興趣，通常滿懷希望，不安，漠不關心，甚至加以蔑視。（註五五）

企業家和大部份工會領袖都反對這種複雜的設計。「參與」帶給企業家莫大的震撼，其中有人會說：「戴高樂從未曾失去對企業家之任何愛顧。」（註五六）一位巴黎計程車司機則表示：「這並非是個壞主意，但要它如何實施，以及誰來執行它。」

（註五七）工會領袖視之為一種對勞工真正利益的障眼法，而管理單位則不要在決策方面受到另外的牽制。（註五八）

戴高樂的文化部長馬爾洛（André Malraux）將「參與」比喻為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的「新政」（New Deal）。（註五九）但「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則稱之為「不受勞資雙方歡迎的舊觀念」。（註六〇）

名政論家阿隆也不欣賞戴高樂總統的「參與」。他在其「無處可尋的革命」(*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一書中提到：「……在企業界引進代表制的民主，對我來說，似乎造成經濟和法國的危機。……不喜歡國會和對話的戴高樂將軍，將到處實施對話和代表制。」（註六一）

對於上述的不安、蔑視和批評，戴高樂一概置之不理，一意想要貫徹其「參與」的主張。他甚至不惜換下在剛結束的選戰中居功甚偉，但却憎恨「參與」觀念的龐畢度總理，而以對戴高樂的主張較為贊同的墨維勒（Maurice J. Couve de Murville）取代之。（註六二）

戴高樂對於「參與」的主張到底做到何種程度？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亦即離他去職之日僅十八天，（註六三）他在與杜亞的對話中表示，一九六九年工人直接參與企業利潤之事已經實施；一九六九年正打算讓國會通過員工參與企業經營的法律。（註六四）由戴高樂自己的話，我們瞭解他的「參與」主張之實現，成效不大。

四、教育的影響

學生爲五月危機的發動者，而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合時宜又是學生暴動的主因之一，因此危機過後，教育制度非有一番革新不可。

在六月七日與杜亞的對話中，戴高樂總統提到大學改革的方向。他說：

「應該做到使大學本身不致於脫離現實而生存；應該使它與我們國家的現代需要配合。我們國家有各色各樣的活動，彼此間完全不同。國家所要求的，就是要大學提供上述各種活動的要素；亦即每一大學科系必須直接配合某一實際的部門；換言之，亦即此一部門保證那些修完此一科系學生之出路。此外，如同我們的國家由各地區組成，希望大學也能適應各該地區的生活，各自發展其特性。……大學的重建和運作應該讓教師和學生參與，……」（註六五）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新任教育部長佛爾（Edgar Faure）在向國會報告時稱，五月暴動乃是「已變成無法忍受的學院教育制度」所造成的「深刻的厭惡」之結果。他的報告爲大學教育制度的改革鋪路。（註六六）

爲有效進行改革措施，佛爾一上任，就更動教育部的重要人事。在其身側有一批強硬派的自由主義份子，如以巴黎大學法學院教授阿里歐（Michel Alliot）爲秘書室主任，以奧爾良（Orléans）大學校長安端（Gérald Antoine）爲其首席顧問。他同時去掉一些擁有「爸爸大學」（l'université de papa）式中央集權觀念的人員，特別是在五月二十一日，危機的高峯時期，同意該部秘書長羅隆（Pierre Laurent）的辭職。羅隆自一九六三年即出任該職，頑固保守，權傾一時，常使歷任有意改革的部長，無法施展其抱負。（註六七）

戴高樂總統和教育部長佛爾要進行大學改革的一項主要目的，顯然是爲防止在一九六八年十月新學年開始時可能再度發生學生暴動。巴黎大學的極端份子會明白表示此一意圖。（註六八）然而，總統、部長和其顧問們所考慮的不僅是此一問題。他們不但要考慮學生的合理要求，而且還要從學生的反叛中取得某些教訓。換句話說，藉助於其徵象所提供的資料來診斷病情，瞭解病因，再設法治療。未來的改革就是要針對這些病因。診斷的兩大要素爲自主（autonomie）和參與。（註六九）

佛爾在七月的國會報告中，同意學生的看法，認爲考試制度過時和武斷，學校設備也不足。他贊成考試的次數要較多、較公平，且要能測驗出一門科目的真正知識，而非僅是記憶。他也會答應在秋天開學時提供兩萬名新生的學習空間。佛爾計劃提出的改革法案，包括成立規模較小的大學，每校的學生在一萬至一萬一千人之間；設立美國式的學系，以較多的「研究、討論、對話」，取代往昔過份強調的課堂講授。（註七〇）

佛爾的高等教育改革法案（Le projet de loi d'orientation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於九月二十一日在國民議會（*l'Assemblée nationale*）提出，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後，於十月十日通過，參議院也在十月二十一日表決通過。（註七一）

根據新的高等教育法，全國六百二十六個學系（UER），每一學系由教授、其他教師和學生組成。每一學系可以選擇與其他不同性質學系，組成一個大學。在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間，新成立的大學約有四十所。每一大學區（académie）有一所或一所以上的大學。（註七二）巴黎目前就有十三所大學。

新的高等教育法強調自主和參與的原則。大學的行政由經選舉產生的校長和八十人以內的校務委員會負責。校務委員會包括教授、研究員、學生和職員，還加上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校外人士；教授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學生代表人數。

大學校長經由大學校務委員會選舉產生，任期五年，不得連任。大學校長不能同時兼學系主任，如非正教授則須得三分之二選票，且經教育部同意。系主任經選舉產生，任期三年。

系務委員會、大學校務委員會和地區委員會的自主權受到某些重要的限制。新聘教師由其他教師選舉產生，而非由委員會來決定。教育部仍然決定考試的水準。

到一九六九年四月為止，六百二十六個學系中有五百三十四個舉辦過選舉。學生參與選舉的比例，文學院最低為百分之四十一，理學院為百分之四十三，醫學院和藥學院為百分之六十八，技術學院（*Les Instituts Universitaires de Technologie*）（註七三）為百分之七十七。儘管大部份學院未達百分之六十的法定人數，但學生參與選舉的比例還是被認為相當高，特別是因為左派學生組織曾發起一項杯葛選舉的運動。（註七四）

五、結論

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危機，為期達一個多月，參與者上千萬人，其規模之大和情況之嚴重，的確對法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造成很深遠的影響。

危機之發生本為破壞既存的社會和打擊戴高樂政權，但是由於戴高樂總統毅然決然地下令解散國會，並運用巧妙的政治手腕，在選戰中贏得輝煌的勝利。左派各政黨在慘敗之後，彼此間的歧見更加深。

危機期間，法國的運輸和經濟活動，幾乎完全陷於停頓狀態。法國的工業生產損失慘重，經濟成長受到嚴重影響，年收入達十餘億美元的觀光事業受到摧殘。資金大量外流，法郎幣值大幅度下跌，法國財政收支無法平衡，迫使戴高樂政府拋售庫存的黃金和外幣，並且還對外舉債，以應付財政和金融的危機。戴高樂大量儲存黃金和打擊美元的意圖，遭到不小的挫折。

此外，為解決罷工問題只好提高工資、縮短工時和改善社會福利措施。然而，隨之而來的是生產成本的提高，境況不佳的工廠倒閉，以及失業人數的劇增。戴高樂總統一向強調，且自認為應付社會變動的妙方——「參與」，也因危機之發生，使他下定決心趕緊設法使之早日付之實施。

危機也加速法國高等教育制度之改革。一九六八年十月經國會通過的高等教育法，使法國的高等教育制度走向民主化和分權。這就是戴高樂所主張的自主和參與的原則。

儘管五月危機使戴高樂在六月下旬的大選贏得國會的絕對控制權，但某些學者也認為此一危機導致工人階級對他的支持熱誠銳減，（註七五）這或許是他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全民複決失敗的潛因。

註釋

1968.

註 1 丘..“Gaulist Gamble Pays Off” Communists Admit Setback”, *The Times*, June 25, 1968.

註 1 二..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Vers le terme 1966-1969*, (Livre de poche, Plon, Paris, 1970), P.319

註 1 三..在第一回投票後，如無候選人贏得該選舉區半數以上選票時，則以得票數最高的兩位候選人，在第二次投票時供選舉人抉擇

註 1 四..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6-1969*, P.341.

註 1 五..*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September 7-14), P.22901.

註 1 六..“Has De Gaulle Pulled It Off?” *Newsweek*, June 10, 1968.

註 1 七..“Revolt Repudiated-For Now”, *Time*, July 5, 1968.

註 1 八..“De Gaulle and the Party of Fear”, *Newsweek*, June 17, 1968.

註 1 九..密特朗在五月二十八日的記者會上公開表示其出任總理的意願。

註 1 一〇..“A First Round for De Gaulle” *Newsweek*, July 1, 1968.

註 1 一一..“Pompidou plays on middle-class fears”, *The Times* June 24, 1968.

註 1 一二..“The Gaullists V. Everybody”, *Time*, June 28, 1968.

註 1 一三..“A First Round for De Gaulle”, *Newsweek*, July 1, 18, 1968.

祖|111..“The Politics of June”,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3, 1968. 諸此和空子反蘇戴高樂辭回覆及示臣顯立空狀。

祖|111..“Don't Cry, Madame”, *Newsweek* July 15, 1968 在危機後期，密特朗公開表示要當總統，蒙德斯·法蘭西斯表明要確鑿理。演繹急於奪權的作派，或許會激起某些譏刺與不滿。

祖|111..Raymond Aron, *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Fayard, Paris, 1968), p. 135; Georges Dupeux, *La France de*

1945 à 1969 (Armand Colin, Paris, 1969), P. 331.

祖|111..“Key Issues Facing France”, *The Times*, June 24, 1968.

祖|111..“Trouble on the Left”, *Newsweek*, July 29, 1968.

祖|111..“Battle for Survival”, *Time*, May 31, 1968.

祖|111..Pompidou warns strikers on injury to the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4, 1968.

祖|111..“Will France Come Back?”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 1968.

祖|111..Another Worry: How Strike Will Cut Tourist Dollar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3, 1968.

祖|111..“France's Tourist Industry Hit by Wave of Cancel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4, 1968”; Has De Gaulle Pulled It Off?” *Newsweek*, June 10, 1968.

8.
祖|111..“As De Gaulle Starts to Pick Up the Piece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8, 1968.
祖|111..“Strike costs airlines over £700,000”, *The Times*, June 5, 1968.

祖|111..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6-1969, P.360; “Is France the New Sick Man of Europ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2, 1968.

祖|111..“As France Fights Chao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10, 1968.

祖|111..Christian Ambrosi et Arlette Ambrosi, *La France 1870 -1970*, (Masson et Cie Editeurs, Paris, 1971), P.272.

祖|111..“Will France Come Back?”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 1968.

祖|111..“As De Gaulle Starts to Pick Up the Piece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8, 1968.

祖|111..“When Europe Looks Ahead Now...”,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17, 1968.

祖|111..“Fears for French economy”, *The Times*, May 23, 1968.

祖|111..“Direct trade with France now at total standstill”, *The Times*, May 23, 1968.

祖|111..“Battle for Survival”, *Time*, May 31, 1968.

祖|111..“Strikes disrupt production in most UK-owned plants”, *The Times*, May 31, 1968.

祖|111..“De Gaulle Encore”, *The Times*, June 25, 1968.
祖|111..“Will France Come Back?”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 1968.

祖|111..“France: A Gaullist Sweep”, *Newsweek*, July 8, 1968.

祖|111..“As De Gaulle Starts to Pick UP the Piece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8, 1968; “Is France the New Sick Man of Europ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2, 1968.

祖|111..詳情請參閱「政大歷史學報」第11期，「法國一九六八年政

起義」了。

祐田 | ..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6-1969, P. 332.

祐田 | ..*Ibid.*, "And Now 'A Third Solution'", *Time*, June 14, 1968.

祐田 | ..*Ibid.*, P.331.

祐田 | ..*Ibid.*, P.357.

祐田 | ..*Ibid.*, P.433. (Entretien Radiodiffusé et Télévisé avec M. Michel Droit, 10 Avril, 1969).

祐田 | .."De Gaulle's Prescription:'Participation'",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3, 1968.

祐田 | .."As De Gaulle Starts to Pick UP the Piece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8, 1968.

祐田 | .."Report: France", *The Atlantic*, Nov. 1968.

祐田 | .."De Gaulle's Referendum"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7, 1968.

祐田 | ..Georges Dupeux, *op.cit.*, P.332.

祐田 | .."De Gaulle Encore", *The Times*, June 25, 1968; "A Sudden Parting: How Pompidou Was Fired", *Time*, July 19, 1968; "De Gaulle's Terrible Swift Sword", *Newsweek*, July 22, 1968.

祐田 | ..「一九六九年四月廿七日，戴高樂頒發懲罰政策，舉行全民複決。」十八日複決結果揭晓，反對票數由廿二日

十一票，他立刻在當天中午，宣佈辭去總統職位。

祐田 | ..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6-1969, P.434.

祐田 | ..Barbara B. Burn, *Higher Education in Nine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broad*, (Mc Graw-Hill Book Co., N. Y., 1971), P.29.

祐田 | ..Pierre Viansson-Ponté,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Gaullienne, tome 2, Le temps des orphelins*, Août 1962-April 1969, (Fayard, Paris, 1971), pp.580-581.

祐田 | .."France: The Hope of Reform", *Time*, August 23, 1968.
祐田 | ..Raymond Boudon, "The French University Since 1968", *French Sociology, Rupture & Renewal Since 1968*,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C. Lemar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Y., 1981), P.181.

祐田 | ..Charles de Gaulle, *op. cit.*, P.358.

祐田 | ..Barbara B. Burn, *op. cit.*, pp.12-13.

祐田 | ..依據一九六八年的憲年成立。一九六八年在十九個大學生和十個系。

祐田 | ..Barbara B. Burn, *op. cit.*, pp. 25-26.

祐田 | ..Philip G. Cerny, *The Politics of Grandeur, Ideological aspects of de Gaulle'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0), P.268.